



清华国学丛书

刘东 著

# 道术与天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清华国学丛书

刘东 著

# 道术与天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术与天下/刘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清华国学丛书)

ISBN 978-7-301-18126-3

I. ①道… II. ①刘… III. ①文化史—中国—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2277 号

书 名: 道术与天下

著作责任者: 刘 东 著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高海云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126-3/G · 299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mailto: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7.5 印张 392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清华国学丛书》总序

在现代中国，“国学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即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恢复建立，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为重振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雄风而尽其努力。

在清学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四年当中，毕业生近七十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近五十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后被称为四大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教育人才的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

关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和精神，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

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所以,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里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主要有二: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激进主义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东方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但它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依然承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我们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但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力图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接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力求把“清华国学研究院”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研究院将依托清华大学现有人文学的多学科条件,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进展,内外沟通、交叉并进,既关注传统学术的总体与特色,又着重围绕中国哲学、中国

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以高端成果、高端讲座、高端刊物、高端丛书为特色,为发展国际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清华国学丛书》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几种高端丛书之一,丛书主要收入本院教授、访问学人的研究成果,及本院策划立项的研究项目成果。这些成果在完成之后,经过遴选而收入本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1年1月

---

## 题 记

---

这是上回那本《理论与心智》的续篇。——如果说，上一本小书的主旨，是要解释和挑战内在世界的分裂，那么这一本小书则更进一步，祈望参照着外部的冲突，来披露和追究内心动乱的根源……

这种内心的动乱，正所谓“道术为天下裂”。——不过，尽管当代心灵已在外物的诱惑下，发生了触目惊心的裂变，我仍一如既往地憧憬着：恰恰经由此种经验世界的接引，手中的道术终将圆融为一，从而帮助我们跨越心与物的鸿沟，更加坦荡地走向天下！

那么，就先拿这本小书来检验一下：自己的心智是否足够宽广博大罢！

作者，2009年12月25日于三亚湾

---

# 这一年：我的咏叹之年

(代序)

---

《中华读书报》主编打电话过来，一定要我以“这一年”为题，为他们写一篇短文。我闻罢不觉一惊，方才记起眼下又是岁末了。

并非在刻意模仿“发奋忘食、乐以忘忧”的圣贤境界，实在是因为这一年之于我，无非是个寻常年份罢了。是啊，人生走到了这一步，无论你再怎么没日没夜，一年忙下来也就顶多意味着：你又写出了几篇得意之作，又指导了一篇叫好的论文，又给研究生开了一门新课，又到国外发表了若干讲演，又把不少同行邀约到北大，又挑中了两个读书种子，又编定了几卷《中国学术》，又主编了十几本丛书，又构想了两个新的项目，——当然也还包括：又买来了不少引人入胜的唱片，又找到了一个静心读书的住处，甚至又发现了几家价廉物美的餐馆……如此而已、而已。

这也许就是所谓“盛年”，——忙忙碌碌絮絮叨叨的盛年，生命被各种责任不断分割的盛年，一切兴奋都已沦为日常的盛年，既无心炫耀也无力反悔的盛年。长我几岁的李零兄，曾在电话中跟我数念说，他身上如今压着三座大山。可我学他的样一掐算：他老兄这才哪儿到哪儿呀？要说我肩头上的这些大山，最起码也得有五、六座吧？

不过，就算我能跟着李零兄数数，却学不像他那牢骚满腹的神态，不然我就不会主动招惹这许多麻烦了。我本性上毕竟是个乐呵呵的山东人，从自己的快乐天性出发，我宁可把盛年时代的这些承担，当作世上最为过瘾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先忙乎完这个再去忙碌那个，正好比拿着此一种快乐，去换取彼一种快乐，或者更直白些，是先过足了这一种瘾头，又赶着去过那一种瘾。

出于这种心理，近来我总是转着这么个念头：想要把眼下正在经历的这个人生阶段，比作一出歌剧中最最过瘾的咏叹调。人们都爱说“人生



如戏剧”，这话原本也不错，只可惜附和者太多便成了俗话。所以，倒不如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重新阐发——要知道我当初也可能以歌唱为生的——不再把人生比作一般的戏剧，而把它比作最让人过瘾的歌剧。

当然我知道，连“歌剧过瘾”这种话都在许多人那里显得过时了。在好莱坞模式所造成的心理定势中，那些每天习惯于消费一个故事的人们，已经越来越没有能力欣赏歌剧（或者京剧等等）了。日复一日的情节刺激，使那些心灵结满了坚硬的老茧，只能借下一个更加紧张的（自然也是更加胡编乱造的）悬念来饮鸩止渴。在这样一种观剧心态中，人们几乎从大幕开启的那一刻起，就猴急地巴望着故事的结局，而不再有心力随着剧情的正常节奏，沉浸在和品味着人生的某一个紧要的瞬间。

然而，既已把这些故事比作人生，只怕最没意思的就要数结局了吧？不管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总归会“百年俱是可怜人”，天底下唯独这一点还算是公平的。既是如此，又干吗非要急急忙忙地往死路上奔呢？干吗不设法定一定格、回一回味，让似水的流年在感觉上飘逸得稍稍慢一些呢？……

由此说来，至少对于那些更想要珍惜生命的人们，与其对他们说“人生如戏剧”，果然不如更加具体地说——“人生如歌剧”。那些人毕竟不那么急于打探情节的终点，而宁可在剧情的缓慢推移中，在剧中人的正常呼吸中，耐心地等候着那一段辉煌的咏叹调。——是的，他们在等候着这个必须拼尽全力来达致完满的巅峰时刻，希望能够伴随着歌者的高音而体验对于极限状态的攀越！

其实，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歌剧，那么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这个盛年，也就正好比人生的咏叹之年。一方面，这无疑是最清楚地意识到生命限制的年岁：此时已不再有从头补课的机会，你以往曾经学会了什么，现在就只能去做什么，从而将来也就只能成就什么。但另一方面，这却又是一个最接近于超越自我极限的年岁：与当下正面临的突破相比，以往的作品有可能太过稚嫩，以后的脑力又有可能有所衰减，全都算不得数，因而只有此时此刻的手笔，最接近于成就一生的功业。

由此说来，在这个生命正高歌行进的盛年，人生实际仍然充满了不确

定性，就像歌剧舞台上那位将要一锤定音的主角，只要他还没把最后一个高峰坚定不移地唱上去，嗓子眼就总难免有些发紧。然而，他却又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哪怕普天下的沉重都压到了脊柱上，这仍将是挖掘生命潜能的最佳时刻，——只要他能像大英雄贝多芬那样，把头颅高贵地昂起来，用自己的全部精思与才华，蘸着内心的全部忧思与向往，谱写出巍峨不拔的传世之作。

只要能心存此念，一个步入盛年的生命，也就没有必要再去伤春了。毕竟，只有足以发出咏叹的这个年代，才最是我们生命盛开的华年。事实上，就像歌剧中最为辉煌的咏叹调，往往要抒发于剧情成熟的时刻，以往你生命历程中的所有细节，无论是胜是负是成是毁，也无非是在铺垫着这个“知天命之年”，——此前的你似乎专在等着此时，此后的你也最要记念此时。由此就不妨说，我们这辈子到底有没有白活，关键就在于是否享有过这样的盛年，是否充分利用了这样的盛年，能否在这个挑战生命极限的岁月，唱出过不可一世的咏叹调。

这或许就是夫子“不知老之将至”的真谛罢？当然，所谓“不知老之将至”，并不是说不会衰老，更不是在自我蒙蔽，而是在摹状一种由于把生命化入大我而不觉忘却小我的得道之境。尽管比起以往任何阶段来，盛年时代都更提示了生命的唯一性，然而此刻，既然观众正济济一堂，乐队也已高奏序曲，我们又何妨在人生旅途中索性酣畅淋漓一回，边走边唱——“咏而归”？

我憧憬着，即使到谢幕以后，那歌声也不会就此消歇的。我平生很不善记述情节，就连别人回忆到我的故事，我看后都觉得懵懵懂懂。然而，我却很会记忆定格场景，无论是“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好景，还是让我触目惊心的败局，都让我永志不忘，构成了我生命中的“形而上素质”。这一点其实也很像歌剧。因为在我看来，叙事结构在歌剧中同样并不重要，不过是在替剧中人铺垫高唱的机会罢了。正因此才决定了，一旦相应的咏叹调已被神完气足地唱罢，那些剧情就不大值得再去重演了，否则观众就会无聊，就会堕入尼采对于人生轮回的厌恶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生中真正剩下的，不正是那些值得在音乐会上千万次重温的、永远

会受到喝彩的音乐亮点 (highlight) 么？

突然想到,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恰值帕瓦罗蒂造访北京,进行他的告别巡回演唱。于是,就很想把这篇短文献给这位歌王——这位曾经带给我如许欢乐与鼓舞的“英雄男高音”。我想对他说,正如我刚刚写下的那样,尽管一位歌者的身体乃至生命,终将有退隐的一天,但他在咏叹之年所发出的那一片拔山盖世的歌声,却是永远不会老去的。

2005年12月9日于京北弘庐

---

# 目 录

---

题记/ I

这一年:我的咏叹之年(代序)/Ⅲ

## 辑一 当代研究

做巴顿,还是做朱可夫? /1

大国之“大”

——王道还是霸道? /14

感性的暴虐

——恐怖时代的心理积存/28

躲不过去的沙尘暴 /40

黑天的故事

——“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52

什么才是“孺子牛”?

——鲁迅的《自嘲》诗与毛泽东的解读/83

“穷得只剩房子了”

——消费主义时代的北京建筑文化/103

中国文化与全球化

——《世界文化报告·中国部分》提纲/114

## 辑二 传统研究

有“节”有“日” /133

个人认同与人格境界

——从跨文化的立场诵读“八条目”/141

“文胜质则史”的真义

——历史与现实中的佞史传统/154

孔子不仅仅是“丧家狗”/165

文字之缘与题跋意识

——关于宋代文人心态的三通批注/168

宽正·沉潜·广大·高明

——关于清华国学院的访谈/176

辑三 比较研究

从“接着讲”到“对着讲”/187

利玛窦的三棱镜 /195

《齿痛》到《药》的变幻/214

翻译与比较

——从钱锺书是否翻译家说起/228

当纪德进入中国

——从其《伪币制造者》中的纹心结构谈起/234

辑四 汉学研究

美国汉学的传教之根 /243

跨国形象与国际认知 /278

未尽的文字缘 /306

中国研究领域的测不准原理/311

清华国学和域外汉学/322

辑五 教育研究

保护大学生态 /328

众生喧哗的大学论说

——写在《大学之忧》丛书前面/343

改革需要远见

——深谈中学应否取消文理分科/385

诸神与通识 /396

人生不过是将错就错

——五十答客问(代跋)/412

---

## 做巴顿,还是做朱可夫?

---

《巴顿将军》和《莫斯科保卫战》，都是我曾经为之入迷的好看电影。我不光是几次三番地观赏过它们，而且，从当初反复阅读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到后来再三重温这两部电影，前前后后这十几年时光，也恰好是我生命中最一波三折、最面临抉择的时期。由此，尽管本意上只是为了消遣，而且我自问也绝非什么卡莱尔学说的崇信者，但在这个到处都是可信侏儒与不可信英雄的年代，从那两部影片中凸显出来的比较确凿的卡理斯玛，没准还真的渗入了我的心念。

我还知道，我这种经历肯定不会是孤立或偶然的。记得大学时代有位同窗，对于本专业真可以说是兴味索然，以至于后来被分配出去教书，甫一开讲就有惊人之语——我在哲学系读了四年书，说穿了都是些废话！可是，就这么个谈不上用功的同学，竟能对《回忆与思考》中的每个细节，包括冗长的军事态势对比，乃至枯燥的武器装备清单，都一五一十地如数家珍，足见军事家朱可夫当年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远远地大过了他的同胞哲学家尤金康斯坦丁诺夫。

不过，直到在研讨比较方法的课堂上脱口而出之前，我并没有打算在这方面进行自我剖析。可那天我在讲台前实在是太忘情太放松了，似乎不是在面对着一群学生，而是在面对着一组精神分析的大夫，一下子把长年郁结的东西全都给释放出来了。而此后，再顺着脱口讲出的思路，来梳理自己曾经做出的大小抉择，竟觉得许多东西都变得清晰起来，——不知是偶然间为杂乱的人生经验找到了某种叙述方式，还是于浑浑噩噩中果有如此自觉严整之追求？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当我在电话里就此向一位多年知己倾谈时，居然这边还未及多言，那边马上就能心领神会了——你肯定是更倾向于朱可

夫的！老友之间如此的心有灵犀，更使我不住地咂摸其中的滋味：会不会自己信口讲出的这些戏言，远不止是大学讲台上一个小小的插曲，倒从某种深层讲出了一代人的隐晦故事？

一

我之所以把本文的话题形容为“插曲”和“戏言”，是因为寻常向同学们讲授的比较研究，往往都是针对文学文本、且都是横跨于中外之间的，但本文眼下想要对比的，却只是两部电影，而且是分属于美国和苏联的电影。

然而，至少在中文的语境中，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两两对应的关联。

首先，这两部影片都是以二次大战欧洲战场为背景的战争片，而且都在刻意制造本国的战神。《巴顿将军》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它的主人公那种明显带有好莱坞夸张风格的外向性格，再配上他身后那幅伟大得“超现实”的星条旗背景，从一开始就强烈地烘托出了这一点。而等影片再放映到美英两国“二士争功”的时候，这种烘托更干脆被一句露骨的台词给直接挑明了——“英国也需要制造它自己的英雄”。另一方面，尽管相形之下《莫斯科保卫战》里的朱可夫形象，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紧身衣之下，不可能承载如巴顿形象中那般飞扬跋扈的想象力，但那位苏联将领绷得紧紧的身板和抿得紧紧的嘴角，仍然冷峻地凝聚着另一种视觉冲击力，其间既有“泰山崩于前”的压力，也有“伴君如伴虎”的紧张。这种风格使人想起俄罗斯辽远大地上低回着的那些沉郁的民歌，想起东正教对于人生苦痛的令人压抑的突出认知，或许正因乎此，此一形象才堪称某一个独特民族的独特民族英雄。

其次，这两位具有不同嗓音类型的“英雄男高音”，又都是在二次大战已经硝烟散尽之后，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潜反省，才由苏美两国以痛定思痛的形式再次播放出来的。我猜想，那恐怕正是拍摄二战影片的最佳时机：时间若再早些，“朕即国家”式的铁腕人物尚未谢幕，便难以获得必要的历史心理距离；可时间若再晚些，记忆的浓度却又要被冲淡，难以



得到必需的投资和观众。另外,就本文的关注焦点而言,亦正是由于有了历史的间隔,苏联导演才敢于不再让斯大林遮挡住一切,从而使得朱可夫的形象有可能脱颖而出。由此,尽管本来只有那部美国影片的主旨才挑明了要来表现某位历史人物,而这部苏联影片的主题本不过是要去复述某一历史事件,但后者毕竟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想象空间,足以在人物塑造方面有所解冻,而不必再沿用一個模子去生产照例患有“伟人症”的领袖形象。

我还猜想,正因为已经享有了相对的个性空间,我们才会在影片中看到,尽管动机、方式和风险都相当不同,但随着故事情节地开展,两位主人公却都曾因为固执己见而突遭解职。看起来,这种令人惋惜的笔锋急转的“临阵换将”,既被两国导演不约而同地搬上了故事情节的核心,就不会是纯属巧合。因为,只有这种为了自主的信念而不惜“抗上”的举动,特别在惯于“以服从为天职”的行伍之间,才能以冷冰冰的官僚体制为背景,演绎出硬踢铁板的戏剧性冲突,而鲜活地映衬出一员虎将的不羁个性。

再次,这两部电影又都拍摄于冷战正酣的年代,而且相对于它们各自的正统意识形态而言,又都算得上该国的主流电影。在这一点上,它们是既不同于《越战启示录》,也不同于《一个人的遭遇》。如果我没有记错,来自共和党右派的尼克松总统,当年就特别爱看《巴顿将军》,而且每看必会忍不住泪水;甚至,据说他在宣布东南亚战场上的美军已经一不做二不休地进入了柬埔寨之前,还特地连续两次调看了它,好借巴顿的虎威来给自己壮胆。拍摄于苏共体制下的《莫斯科保卫战》就更不用说了。即使对杀人如麻的斯大林,它也尽量勾画出这位独裁者的正面形象,比如让他在得知卓娅惨遭处死之后,居然在强敌正摧枯拉朽地兵临城下之际,毫不示弱且出人意料地宣布——从此不再接受德军某团任何官兵的投降!即使这种“格杀勿论”的命令有点儿横蛮,也确实表现出了凛然令人起敬的钢铁意志。

然而细品起来,这两部主流电影,似乎又都对各自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一点小小的质疑。不难想象,以尼克松后来的惨痛挫折,也以他那高